

黄兴与辛亥革命

萧致治 聂文明

黄兴(1874——1916)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领袖。辛亥革命时期,他与孙中山共同领导了推翻清王朝的伟大斗争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。他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,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,无论是建立革命政党,还是组织、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斗争,以及开展其他形式的斗争,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宋教仁指出:黄兴“与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。”研究辛亥革命史,不能不研究黄兴。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,同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一样,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。

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,又是黄兴逝世七十周年,探讨一下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,肯定他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,缅怀前人,激励来者,对于鼓舞人们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,将是具有意义的。

一、协同孙中山创建同盟会,为革命提供组织保证

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。同盟会的成立,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。孙中山曾说:“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,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”。^①集合全国之英俊,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,孙中山有首倡之功,黄兴更有赞助之力。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,到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,7年之间,黄兴不仅是同盟会的杰出组建者,而且在维护团结、巩固发展组织等方面,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首先,黄兴在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同盟会成立初期,参加者主要是全国各地集结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。同盟会成立之前,黄兴既是华兴会的领导人,又是东京留学生的领袖;而孙中山,当时对东京留学生联系极少,与黄兴也是初次相识。1905年7月,当孙中山到达日本时,首先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打听留学生中是否有杰出人物?宫崎即说:“仅仅两三年间,留日学生猛增,有一个叫黄兴的,是个非常人物。”^②在宫崎的引荐下,孙、黄在中国餐馆风乐园第一次会见,孙中山提出“联络湖南团体中人”,立刻得到黄兴的同意。起初,在华兴会内部,主要骨干对联合的认识并不一致:有的赞成,有的反对,有的态度暧昧不明。华兴会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革命小团体,如果华兴会因为意见不一,拒绝联合,指望实现全国革命派联合则无从谈起。由于黄兴从中做了大量工作,同盟会成立时,在东京的华兴会员几乎全部加盟。黄兴本人曾有过“形式上入孙逸仙会,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”的意见^③,随着同盟会的正式成立,这种隔膜迅速消除,并无丝毫芥蒂。即使原来反对加入的刘

林生(即刘揆一),后来不但加入了同盟会,而且从1907年2月起,还代理黄兴,长期担任同盟会的庶务,在坚持原则、维护团结方面,表现十分坚定。自从成立同盟会起,华兴会再也没有作为小团体进行活动。原来华兴会的骨干,如陈天华、宋教仁、张继、刘揆一等都成了同盟会的骨干。同时,由于黄兴带头加入同盟会,受同盟会影响的留学生也踊跃入会。1905年7月30日,在东京赤坂区内田良平家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,到会者70多人,属于孙中山的旧相识者只有10人,还包括寅崎寅藏、内田良平、末永节等三位日本友人,^④其余多是与黄兴一道加入过拒俄义勇队、军国民教育会、华兴会等爱国革命团体,或受到黄兴影响的留学生。

同盟会成立后,黄兴在留学生中积极发展会员,派遣会员回国,在各省建立同盟会分支机构,使同盟会的组织得到迅速扩大。据统计,1905年至1906年间,加入同盟会的共有962人,其中在东京加盟的占90%,达863人。在这800多人中,湖南籍有157人,湖北籍106人,都受过黄兴的影响。后来的许多著名人物如秋瑾、阎锡山、谭人凤、李烈钧、孙传芳、尹昌衡等,都是这一时期由黄兴介绍或主持加盟的。同盟会成立前,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,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;同盟会成立后,各省分支机构相继建立,各地革命活动纷纷开展。到辛亥武昌首义止,在国内建立的同盟会支部和分会达69个,分布于全国21省;此外,通过同盟会会员活动,建立的外围性组织的会、社共101个,分布全国19个省。^⑤这些分支机构与团结在同盟会旗帜下建立的革命小团体,为革命活动在全国展开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。这些虽然不是黄兴一人之功,但作为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的他,在国内组织的发展上是起过重大作用的。

由此可知,黄兴在同盟会的建立和组织的发展上,其贡献是异常巨大的。

其次,协助孙中山筹划、主持本部工作,为同盟会各项活动的开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孙中山身为同盟会总理,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,是由他亲手制定的;至于把纲领主张付诸实施,以及处理日常会务,则大多由黄兴主持。在同盟会里,黄兴尊敬孙中山,孙中山依重黄兴,两人密切配合,协力开展工作,促使同盟会各项活动得以顺利进行。同盟会成立前,孙、黄等在程家柅家商谈党名,孙中山提出定名为《中国革命党》;黄兴认为此名一出,党员行动不便。经过讨论,孙中山接受了他的意见,定名为《中国同盟会》^⑥。在7月30日的筹备会上,黄兴与陈天华、宋教仁被推为会章起草人。8月20日,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,会议由黄兴主持,并由他宣读了《同盟会章程》。章程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民国,平均地权”为同盟会革命宗旨,设总部于东京,设分部于各地。在确定总部人选时,黄兴提议:“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,不必经选举手续”^⑦,经大家一致通过;孙中山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,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。总理他适,即以庶务代行一切。故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。同盟会成立不久,孙中山即离开日本去东南亚,以后虽曾三次赴日(1906年4月、10月,1910年6月),但总计停留时间只半年多,东京总部工作,主要由黄兴主持。

《民报》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,是同盟会进行革命宣传的主要工具。它的前身乃是宋教仁等主办的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。提议将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社改为《民报》社的不是别人,正是黄兴。办理移交手续,正式主持接收的也是黄兴。同盟会由于有《民报》作为自己的喉舌,以后在宣传革命纲领政策、以及与改良派论战中,都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同盟会成立时,只起草通过会章,并未发表宣言。至于起义胜利后的政策制订和各项工作如何进行,均未作具体安排。1906年秋冬,孙中山再度到日本,章太炎这时也已在上海出狱,由同盟会派人迎往东京主编《民报》。黄兴与孙中山、章太炎等协商,鉴于革命风潮日盛,党人遍布各地,各自为政,难于划一,为了适应革命发展和起义的需要,他们又共同制定了《革命

方略》，内容包括《军政府宣言》等十一个文件，后来又补充了《招军章程》、《招降清朝兵勇条件》两篇，这十多个政策性文件，对指导武昌起义及以后各地革命党人的工作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，而且防止了各地政令不一，各自为政的现象。

第三，维护团结，反对分裂，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，保证了革命工作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健康发展。团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，特别是领导核心的团结，对革命的成败关系更大。同盟会成立后，由于大家革命目标一致，为同盟会内部的团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；但是，也曾因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分歧，弄得风潮迭起，几乎陷于分裂。由于黄兴坚持维护革命团结，对这些风波采取了正确态度，才避免了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害。

1907年初，同盟会召集干事会，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旗式，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，理由是这种旗式系烈士陆皓东设计，“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曾先后为此旗流血，不可不留作纪念”。与会者提出了各种方案：有的提议顺应中国历史上习惯用五色旗，有的提议用十八星旗，借以代表十八行省；有的主张用井字旗，以示平均地权之义。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“形式不美，且与日本旭旗相近”^⑧，主张用井字旗。孙中山坚决反对，声言“仆在南举，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。欲毁之，先毁仆可也”^⑨。黄兴怒而退会，甚至表示“欲退会断绝关系”^⑩。旗式问题本来可以从长计议，可是因为双方都动了肝火，闹得几乎无法收拾。幸亏黄兴识大体，顾大局，事过境迁，冷静下来之后，为了维护团结，主动作了让步。这场几乎导致孙、黄彻底决裂的争执，因为黄兴宽容大度，很快得以平息。

孙、黄争执刚刚解决，章太炎等又掀起倒孙风潮。同年6月，章太炎等因孙中山未及与大家商量，接受了日本方面公私赠款15000元，并将这笔款的大部分用作南方起义经费，只给《民报》留下2000元。章太炎对此十分不满，便煽动部分在东京的同盟会员攻击孙中山，逼迫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，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，改选黄兴继任。刘揆一坚决拒绝了章太炎等人的错误主张，并且做了许多解释说服工作，同时急函香港之彭邦栋转告黄兴。黄兴闻讯，立刻复函表示：“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，而非个人名位问题。孙总理德高望重，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，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，且免陷兴于不义。”^⑪这次倒孙风潮，只要黄兴稍为游移，就可能使同盟会导致分裂。由于黄兴以革命利益为重，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，拒绝出任总理，这场倒孙风潮才未成为事实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1908年秋冬，陶成章带着章太炎所印《民报》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，并要求孙中山拨款3000元作为《民报》印刷费。因为孙中山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，陶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赴南洋各地筹款又不顺利，就由怀疑孙中山在后面捣鬼进而反对孙中山，并且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，重建光复会，与同盟会南洋支部公开对立。第二年9月，陶成章在南洋纠合李燮和、柳聘农等7、8人，盗用川、广、湘、鄂、江、浙、闽七省同志名义，起草了一份《孙文罪状》，指责孙中山“谎骗营私”，“残贼同志”、“蒙蔽同志”、“败坏全体名誉”，要求“开除孙文总理之名，发表罪状，遍告海内外。”陶成章还带着这份“罪状”赶赴东京，找到黄兴，要挟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。在这决定同盟会存亡盛衰的关键时刻，黄兴再次顾全大局，坚决拒绝开会讨论，拒绝散发所谓“孙文罪状”，并与谭人凤、刘揆一联合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公函，逐条替孙中山辩解，指斥陶成章等“妄造黑白，其居心险毒，殊为可恨”！并向孙中山表示：“陶等虽悍，弟当以身力拒之。”^⑫黄兴一方面坚持原则，反对章、陶无端攻击、造谣诬蔑；另一方面仍以团结对敌为重，对章、陶进行说服劝解，使章、陶等态度逐渐有所转变。1910年11月，陶成章回心转意，表示“孙文以后不必攻击”，特别不宜攻击“个人私德”^⑬。在这场最激烈的倒孙风潮中，如果不是黄兴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总理地位，及时揭穿

谎言，而是任凭造谣中伤，将会使孙中山威信扫地，同盟会很可能趋于瓦解。由于黄兴采取坚决态度，及时澄清了事实真相，章、陶的倒孙风潮才再次遭到挫败。

同盟会是以孙、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。黄兴维护孙中山的威信，巩固了孙、黄团结，也就是巩固了全国革命领导核心同盟会的团结。教育与争取了大批不明真相的人，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在同盟会领导下顺利前进。

二、组织领导一系列武装起义，为革命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

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，是战争解决问题。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，是辛亥革命时期推翻清朝统治斗争的一个主要部分。同盟会成立以后，黄兴是武装反清斗争的著名组织者和领导者。他带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赴汤蹈火，冲锋陷阵，猛烈地向清朝统治者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，为埋葬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清朝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。

早在同盟会成立前，黄兴就十分注意武装斗争。他少时喜欢练拳习武，“只手能举百钧”，有一身好武艺；东渡日本以后，曾请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，学习兵法，利用空余时间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及军队的野外演习。每天清早起床，总要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。他认为“救国不独心力，尤以身力为必要。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，才真有力。”本着这个宗旨，他在宏文学院领导湖南籍学生组织“土曜会”，“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”，鼓励大家“从事用兵，以破坏现状为出路。”^④1903年，沙俄拒不从我国东北撤兵；东京留日学生500余人集会，愤怒声讨沙俄侵华罪行，他和蓝天蔚、钮永建等组织拒俄义勇队，准备开赴东北，抗击沙俄侵略。华兴会成立，他又另外创立同仇会和黄汉会，专门联络会党与运动军队，决心以武力推翻清王朝。他早期的这些军事活动，为他后来指挥领导武装斗争准备了较好的条件。

同盟会成立以后，黄兴在发展和巩固同盟会组织的同时，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。

组织起义首先要有一批坚贞可靠而又熟悉军事的人作为领导。为了积聚军事人才，他在日本积极发展了100多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加入同盟会。考虑到陆军学生回国后将掌握兵权，为了不致露暴革命的真面目，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不必和同盟会总部往来，所有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由他亲自保管。他还从这些人中选择一批坚定的革命同志组成“丈夫团”，“以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’，作为团员的应具的品德”。“丈夫团”成员如李根源、李烈钧、程潜、李书城、赵恒惕、黄郛、尹昌衡、黄恺元、叶荃、曾继梧、程子楷、耿觐文、仇亮、陈之骥、王孝缙等后来都成为各地起义的重要将领，为辛亥革命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
为了策动各地武装起义，自从1906年起，他与孙中山计议，陆续派遣同盟会员分赴全国各地，联络会党，策动军队，互相配合，共同举义。他派刘道一、蔡绍南、彭邦栋、覃振、成邦杰等回湖南，运动会党、军队起义；派胡瑛、梁钟汉、朱子龙回湖北谋响应，又与宋教仁商定，由宋偕同白逾桓、古川往东北运动绿林武装马侠李运春等，筹建辽东支部和起义武装；他自己也曾亲赴广西，策动清军官兵举义。此外，全国各省均派有同盟会员运动会党和军队以及军事教育机构，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，为武装起义积蓄力量。由于同盟会员在各省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发动，积蓄了广泛而深厚的革命力量，为武昌起义后一省发动、各省响应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
黄兴不仅是武装斗争的组织者，而且是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者。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，他几乎无役不与。1907年12月镇南关之役，黄兴与孙中山亲赴前线阵地，持枪作战，

点放大炮。1908年春，钦、廉、上思之役，黄兴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200多人，背着200多枝五花八门的杂枪，从安南（今越南）进入钦州，转战于钦州、廉州，上思一带，和清朝的众多军队相持40多天，以少胜多，连战皆捷。小峰一役，600多清军大败，仅剩残兵50多人脱逃；马笃山一战，把清军督带官龙某击落马下，俘斩清军哨官2名，夺获清军军旗，将清军全部击溃，“敌人闻而生畏，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”。^⑤特别是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，黄兴决心拼死一战。起义发动以后，他率领“选锋队”120多人，向两广总督衙门发动猛攻，击毙卫队管带，冲入督署，总督张鸣岐闻风逃走。在没有搜捕到张鸣岐的情况下，放火焚毁督署，后在撤退途中，碰上李准率领亲兵大队和巡防营，双方展开激战。他在右手中食二指被打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，打死打伤敌人多名，最后弹尽援绝，才化装逃离广州。在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中，这是准备最充分、影响最深远的一次。起义虽然失败，却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，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，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。诚如孙中山说的，“是役也，碧血横飞，浩气四塞，草木为之含悲，风云因而变色。全国久蛰之人心，乃大兴奋，怨愤所积，如怒涛排壑，不可遏抑，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。则此役之价值，直可惊天地，泣鬼神，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。”^⑥这次起义，直接铺通了革命胜利的道路，成了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。

三、运筹帷幄，驰骋疆场，为建立民国立下殊勋

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华民国的成立，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。在这场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派和清朝反革命派的斗争中，作为革命主将的黄兴，筹谋策划，奋力拼搏，为争取革命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过去，有些人只看到他在汉阳战役中的挫败，就说他是“汉阳败将”，这是极不公平的。其实，他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，其中革命每前进一步，他都对革命胜利作了竭尽全力的贡献。

武昌起义如同一把刺刀插进敌人心脏，对清政府来说，真乃是致命的一击。黄兴虽然未能亲自领导这次起义，却早就预见到这次起义爆发的必然性，并作了相应的布置。自从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，黄兴总结了在华南历次发动起义失败的教训，在战略上作了重新考虑。1911年7月，谭人凤、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，决心联络长江各省在中部发动起义，立即得到黄兴的积极支持。他认为这一主张能使“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，更能力争武汉。老谋深算，虽诸葛复生，不能易也”^⑦。为了配合中部同盟会行动，他制定了十一省同时举义计划，布置各省党人积极进行准备，同时分电孙中山、冯自由及海外华侨，告以国内大好革命形势，吁请“速筹大款，立予救援”^⑧。他自己则静候一旦筹款稍有眉目，即准备动身，亲临指挥。武昌起义前5天，他在致冯自由书中详述了长江各省形势后充满信心地说：“今既有如此之实力，则以武昌为中枢，湘粤为后劲，宁、皖、陕、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，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。急宜趁此机会，勇猛精进，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，事半功倍。”^⑨可是，正当他积极筹划，着手进行之际，由于一个偶然突发事件，武昌起义提前爆发了，黄兴因此未能赶上直接参加起义。尽管如此，如果没有他的事先联络策划，各省就很难同时并举。所以，他的策动之功，仍然是不可磨灭的。

武昌起义以后，清廷上下惊慌万状。他们认为“武昌为长江之襟喉，全国之冲要”，乃关系清朝命运的“存亡关键”，于是“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”^⑩，立刻停止正在进行的永平秋操，将北洋精锐军队编为三军，以一军守卫京都，以两军南下武汉，并令水师提督萨镇冰率领巡

洋舰队和长江水师沿江西上，一齐向武汉发动猛烈反扑。武汉军民凭借勇锐士气，最初一度取得了胜利。随着清军大举南下，民军由于多是新招之兵，未经训练，而且是以一隅而敌全国清军精锐，势力渐渐不支。战士伤亡数千名，许多英勇奋战的指挥官，如谢元恺、蔡德懋、马荣等先后阵亡。到了10月下旬，民军步步退却，前后奉命赴汉口指挥作战的何锡藩因伤退下火线，张景良叛变通敌，姜明经惧怕强敌，借故返回武昌。强敌压境，前线却无人指挥作战。正是在这生死存亡关头，黄兴于10月28日化装由上海抵达武汉，立即挑起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重担。当天，他亲临前线视察，随即返回武昌与黎元洪等筹议战守；当晚，又偕杨玺章、查光佛、蔡济民等赶到汉口前线，设总司令部办公处于满春茶园，清点民军仅得7000多人。第二天，他组织民军分两路发动反攻，右路一度取胜，夺回山炮四尊，缴获弹药几千箱，把敌人赶到歙生路铁道以外。由于敌人以树林作为隐蔽，用机枪扫射，民军不能前进，纷纷退却。虽然黄兴率领敢死队亲自督阵，反攻计划仍然未能实现。在黄兴坚持抵抗下，民军分散隐蔽在汉口市区的房屋继续进行战斗，迫使清军无法进入市区。后来，冯国璋悍然下令放火烧毁民房，民军失去屏障，黄兴应黎元洪之召回到武昌商议，才撤出汉口，退保汉阳。

11月2日，黄兴被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，全权指挥汉阳战守。第二天他在汉阳昭忠祠设立司令部，一方面在汉阳紧急布防，一方面致信上海革命党人，促令尽快响应。在黄兴敦促下，上海很快发动起义，造成汉口一失，“能取上海以抵之”的新局面。在20多天的汉阳保卫战中，黄兴日夜操劳，经常亲临前线督战，即使危在旦夕，他还一方面派石陶钧急“速赴湘，助谭延闿谋急救与根本发展”^{②1}；另一方面仍然无所畏惧地指挥民军与优势清军进行拼死搏斗，即使“敌军炮弹落近数武，亦不少动”。直到最后时刻，由于炮队管带张振臣通敌为内应，“龟山、黑山之炮皆不发，地雷火线亦被割断，清军奋力进攻，复占龟山、黑山、四平山、梅子山等地，汉阳遂不能守”。^{②2}黄兴在汉阳城破之际，决心与城共存亡，后因同志们强迫他撤离，才乘江轮返回武昌。

黄兴从10月28日抵汉，到11月27日汉阳失守，整整奋战一个月。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未能挽回败局，但歼灭了北洋大量精锐，使敌人再不敢进攻武昌，只得停战议和。而且赢得时间，使山西、云南、上海、贵州、浙江、江苏、广西、福建、宁夏、重庆等得以乘机起义，终以一隅之失换来了全局的大胜利。正如居正所言：“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，各省得乘机大举，次第响应，俾革命之声威日壮，基础日固，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。使当日无克强，则汉阳能守与否？尚属一问题。尤可虑者，清之故吏与宿将，都无人格可言，无思想可言，遭时扰攘，翻云覆雨，今日独立，明日取消，山东孙宝琦其明证也。故克强之功，不在守汉阳之孤城，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。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，含辛茹苦，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，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，促各省革党之崛起。……虽曰民众心理早已趋向独立自由，故清廷无所寄，而不得不土崩瓦解，然使武昌起义仅如昙花一现，则各省亦无从继起矣。阳夏之坚苦支持，自不得不归功克强。”^{②3}冯自由也说：“坚守汉阳，与清军相持者一月，各省遂得乘机大举，先后响应。……清廷知大势已去，始派使南下议和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，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。故克强之功，虽在坚守汉阳，而其能坚守汉阳，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，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。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，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，心力交瘁，则非战之罪也。”^{②4}这是精当不移之论，也是最公正的评价。武汉保卫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、持续最长的一次大战，黄兴作为指挥作战的主将，战略、战术上虽也有某些可议之处，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，他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以大无畏的精神，与敌人血战一月，其功劳仍然是不朽的。

武汉保卫战受挫，虽然曾使黄兴愤不欲生，但没有使他灰心丧气。他怀着与清政府誓不

两立的决心，愈挫愈奋，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。汉阳失守的第二天早晨，他便乘轮东下。12月1日刚抵上海，即对《民立报》记者表示：“此行目的，在速定北伐计划，并谋政治之统一。”^①第二天，南京光复，他一方面立即电告黎元洪，一方面和章太炎、宋教仁等商议，为统一江苏军政，推举苏州都督程德全“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，一以资镇守，一以便外交”；^②又和章、宋联电林述庆，建议先进兵临淮，指出“鄂事紧要，亟待应接。临淮关须有劲旅驻守，既可进取，又可为援鄂之策应。”^③12月4日，驻沪各省代表举行联合会，选举黄兴为大元帅，黎元洪为副元帅，并于第二天召开欢迎大会。黄兴却坚辞不受，表示“愿领兵北伐，暂捣黄龙，以还我大汉河山”^④。以后又制定五路北伐计划，积极为摧毁清军作准备。

在筹划北伐同时，黄兴还为南北和谈出谋划策，积极谋求政治统一。当时南北和谈正在上海进行，表面上，和谈的会议厅里是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会谈，实际上，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，都是由黄兴亲自裁定。

南京攻克以后，革命党人控制的独立省份已过2/3，为了统一全国革命力量，急需建立临时中央政府，以资统一全国革命力量，协调行动，也便于对外交涉。黄兴为了成立临时政府，折冲磋商，同样煞费苦心。首先碰到的是临时政府地点问题，章太炎主张设在武昌，各省都督代表也已通过。但当时武汉在汉阳失守之后，清军云集，军事吃紧，临时政府设在那里很不适宜。为此，黄兴力主设在南京，后经多方劝说，各省都督代表会议才改变决定，由武昌改为南京。其次是临时政府人选问题，各省都督代表都主张黄兴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，他一再辞谢，认为只有孙中山可当此任。可是，孙中山迟迟未归，到了12月中旬，在无可奈何情况下，才同意以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，组织临时政府。正当他筹划大体就绪，准备动身由上海赴南京之际，得悉孙中山已经回国，他又立即停止出发。待孙中山抵达上海，他立即与陈其美、宋教仁等密议，向各省代表提议，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，组织临时政府。正是由于黄兴积极谋划，1912年元旦，南京临时政府组成，中华民国才得正式宣告成立。从此，在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，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。

由上可知，黄兴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成立，三、四个月里，几于无时无刻不在为夺取革命胜利、建成中华民国操劳。因此，人们把黄兴和孙中山同列为开国元勋，黄兴是当之无愧的。孙中山说：“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，亦革命成败之关键”，^⑤乃实至而名归的至理名言。

注释：

- ①⑤ 《有志竟成》，《孙中山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第201、204页。
- ② 宫崎演藏：《清国革命军谈》，《宫崎滔天全集》，第一卷，第283页。
- ③⑩ 《宋教仁日记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第91、342页。
- ④⑥⑦ 《中国同盟会史料》，《革命文献》第二辑，第142—148页。
- ⑤ 据周兴梁统计，见《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》，第256—274页。
- ⑧②④ 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初集，第18、234页。
- ⑨ 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，《近代史资料》1957年第一期，第121页。
- ⑪⑫⑬⑭ 《黄兴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7、9—10、63、67页。
- ⑮ 《陶成章信札》。
- ⑯⑰⑱ 《黄兴年谱》，第22、129、144页。
- ⑲ 孙中山：《〈黄花岗烈士事略序〉》，《孙中山全集》第6卷，第50页。
- ⑳ 《辛亥革命》资料丛刊（5），第341、406页。
- ㉑ 张难先：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，第121页。
- ㉒ 居正：《辛亥札记、梅川日记合刊》第71—72页。
- ㉓⑳ 《民立报》1911年12月3日。
- ㉔ 《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》，第554页。
- ㉕ 《民立报》1911年12月6日。
- ㉖ 《孙中山全集》第1卷，第536页。